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以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为例

张立¹ 王亚华^{1,2}

摘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突破农村集体行动困境、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7年的暑期调查数据，以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为例，对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体经济既可以通过村干部领导力影响村庄集体行动，也可以通过村民归属感影响村庄集体行动，还可以通过村干部领导力影响村民归属感，进而影响村庄集体行动。其中，村干部领导力是最主要的路径。进一步探讨发现，集体经济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的村庄差异。村庄治理失灵会削弱集体经济对村干部领导力和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也会制约村干部领导力的发挥。只有在治理有效的村庄，集体经济才会促进村庄集体行动。本文深化了集体经济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机制认识，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关键词：乡村治理 领导力 归属感 集体行动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注码：**A

一、引言

“农村公共事务是超出乡村个体与家庭范畴、对乡村居民产生影响的事务，因其与社区的公共利益相关，需要在社区层面达成治理的共识（王晓毅，2016）”。但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乡镇企业改制、农村税费改革等制度变迁以及市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家庭从原本依附的村集体中脱嵌，农民个体逐渐独立、甚至逃离村庄，村集体大多也失去了经济保障和组织动员能力，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面临严重危机：一方面，由于与村集体的制度化关联淡化，家庭缺乏对村庄事务的热情和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中国公共政策理论与治理机制研究”（71721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农村集体行动机制与公共事务治理”（71573151）、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乡村振兴中的公共治理机制与政策研究”（2017THZYX02）的资助。感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提供研究数据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但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王亚华。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解决公共问题的积极性；个体理性的崛起，更导致了投机行为泛滥、精英剥夺严重、公共选择趋于瘫痪等困境（陈潭、刘建义，2010）；另一方面，村集体薄弱化、空壳化，导致村庄公共事务无从开展，公共性严重衰落（吴重庆、张慧鹏，2018），无人干事、无人管事成为村庄普遍遭遇的难题。

有研究指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危机的实质是公共事务治理从“集体化”转向“个体化”，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全面衰落（王亚华等，2016）；除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等宏观因素之外，劳动力外流（Wang et al., 2016；唐林等，2019）、资源条件的恶化、经济地理的变迁、村民间异质性增加、对农业依赖性的下降（王亚华，2017a）以及土地细碎化（Zang et al., 2019；王亚华、臧良震，2020）等是造成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全面衰落的重要因素。但也有研究认为，集体经济的瓦解是导致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缺乏激情和热情的重要原因。换言之，集体经济也是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

从政策文件来看，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的政策文件，重新重视集体经济的作用，将其视为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完善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①。从现有相关研究的结论来看，集体经济能够促进村庄集体行动（Zang et al., 2019），在集体经济的支持下，村庄可以动员干群通力合作自主实施公共项目，提高村庄集体行动水平（吕德文，2019），而且集体经济实力越强，集体合作越容易成功（彭长生、孟令杰，2007）。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主要强调集体经济直接提供资金支持的作用，没有考虑其他的影响路径；二是很少给予集体经济这一变量足够的重视，大多研究将其视为控制变量，缺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实证分析。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利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7年的暑期调查数据，以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为因变量，以集体经济收入为核心自变量，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框架系统分析集体经济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因果关系，具体讨论以下三个问题：集体经济对村庄集体行动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村庄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文献梳理提出研究假说和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介绍研究使用的数据、变量和方法，第四部分检验集体经济是否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第五部分检验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以及影响的差异，第六部分是总结和讨论。

二、研究假说与分析框架

（一）集体经济直接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由于理性的成员会尽可能地避免承担成本而更多地分享由他人提供的收益，导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曼瑟尔·奥尔森，1995）。因此，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通过自主组织、自主治理来规避搭便车、逃避责任与机会主义等困境，进而实现共同利

^①参见《关于印发〈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农[2015]197号），http://nys.mof.gov.cn/czpjZhengCeFaBu_2_2/201512/t20151204_1598131.htm。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2012)。有研究指出, 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是导致农民自主治理能力欠缺和合作困境的重要因素(毛寿龙、杨志云, 2010)。就集体经济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而言, 已有研究表明, 集体经济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正向的影响(Zang et al., 2019), 能够促进农民自愿合作供给公共物品; 而且集体经济实力越强的村庄, 集体行动越容易成功(彭长生、孟令杰, 2007)。一方面, 集体经济收入充实了村庄财力, 提升了村集体公共投入的能力; 而村集体投入可以降低村民筹资成本, 进而影响村民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李秀义、刘伟平, 2016)。另一方面, 当公共物品供给在不同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之间面临选择困境时, 村集体通过资金配套、村民付费的方式, 可以诱导受益村民在获得更大收益的激励下积极主动参与公共物品供给(汪吉庶、张汉, 2014)。简而言之, 集体经济可以为村庄集体行动直接提供资金支持, 降低合作成本, 增强合作收益, 提升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 从而克服搭便车困境, 促进村庄集体行动。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1。

H1: 集体经济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集体经济通过村干部领导力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1. 集体经济可以提升村干部领导力。(1) 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吸纳村庄精英, 提升村干部的整体素质。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庄, 会拿出一定比例的收入保证村干部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村干部职位获得的收益增加, 不仅可以吸引具有领导力的村庄精英进入村干部队伍(付明卫、叶静怡, 2017), 还可以激发村干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徐朝卫、董江爱, 2018)。(2) 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高村干部的权威和声望。集体经济实力是村庄实力的突出表现。实力强大的村庄获得外界关注和支持更多, 村民对村干部的认可程度也更高, 村干部的权威和声望随之提升, 有利于村庄精英社会价值的实现(徐朝卫、董江爱, 2018), 使村干部真正找到“当家人”“领头雁”的感觉(邓卫华、滕军伟, 2020)。(3) 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增强村干部的奖惩能力和强制能力。集体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乡村公共权力的权力资源, 强化了公共管理能力(项继权, 2002)。村干部可以利用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惩机制(贺雪峰、何包钢, 2002), 赋予村内公共权力以强制性(王振标, 2018), 比如将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共享与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相结合, 进而提高村干部治理能力(胡丽燕, 2020)。反之, 对于没有集体经济支撑的村庄而言, 基层组织的领导能力和村民自治能力都会下降(桂华, 2019)。(4) 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强化对村干部的问责, 促使其做一个公道、清廉、奉献的领导者, 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导力。一方面, 集体经济收入较多的村庄, 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要求更高, 更加重视选举问责。例如, 在村庄治理过程中, 更注重程序合法性, 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更强、参与程度更高, 选举竞争更激烈(胡荣, 2005; 卢福营、金姗姗, 2008)。另一方面, 集体经济收入较多的村庄, 村民也会利用历史传统和惯例对村干部进行非正式问责, 比如要求提供福利和分红。

2. 村干部领导力可以促进村庄集体行动。一方面, 村干部领导力通过激励或约束村庄成员直接影响村庄集体行动。领导者在确立目标、协调监督、解决争议或实施奖惩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Glowacki and Von, 2015)。当群体无法通过自愿贡献提供公共物品时, 引入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可以解决集体行动的组织、监督和制裁问题(Van Vugt and De Cremer, 1999)。成功的领导者能够说服社区成员自愿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Nagrah et al., 2016)。当群体认同度低、缺乏信任时, 比较强硬专制的领导

者通过解决初始的交易成本问题，能够在不依赖合作者之间相互信任的情况下，促进集体行动（Raymond, 2010）。另一方面，村干部领导力可以通过村民归属感间接影响村庄集体行动。成功的领导者能够分享群体特征、规范和价值，更好地鼓励成员自愿做出贡献（Van Vugt and De Cremer, 1999）；而且通过培养归属感，有能力的领导者可以将追求个人利益转向追求集体利益，促进群体内部的合作（De Cremer and Van Knippenberg, 2002）。此外，提升村干部领导力也可以提升村庄集体行动水平。有研究认为，以基层党建为抓手，提升基层干部的领导力，强化基层治理能力是破解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政策取向（王亚华, 2017a）。实证分析也表明，通过向农村进行领导力供给有助于提高农村集体行动水平，实现农村公共事务的“良治”（王亚华、舒全峰, 2017；舒全峰等, 2018）。

总之，集体经济可以提升村干部领导力，而村干部领导力可以直接或通过村民归属感间接促进村庄集体行动。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和假说3。

H2: 村干部领导力在集体经济与村庄集体行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3: 村民归属感在村干部领导力与村庄集体行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集体经济通过村民归属感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1. 集体经济可以提升村民归属感。一方面，集体经济通过提供分红、福利和公共物品可以直接提升村民归属感。分红和福利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集结散落各地的村民或股东（崔琳, 2020）。借助福利的方式，集体经济不仅可以为村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还可以增强村民对村集体的认同与支持（陈家建, 2011），进而提升村民归属感。在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村庄，村集体没有能力进行分红和提供普惠性的福利；但在有了集体经济收入之后，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比如对公共设施进行维护，解决公共问题和公共需求，也能增加村民归属感（孙爱东, 2018）。另一方面，集体经济通过村干部领导力间接提升村民归属感。集体经济可以提升村干部领导力，有领导力的村干部有意愿也有能力为村民办实事，让村民共享村庄发展的成果，逐渐在群众中获得威信和话语权。此时，村民不仅能获得经济收益，还对村庄产生了归属感（于涛, 2020），愿意跟随村庄领导，从“各扫门前雪”开始关注集体，积极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邓卫华、滕军伟, 2020）。反之，缺乏领导力的村干部不能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也无力解决村民最关心最迫切的利益和需求，就会逐步失去信任和支持。此时，村民对村干部没有好感，对村庄也没有归属感，形同一盘散沙，很难组织动员。此外，一个好的领导是维持村落共同体运转和促进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王亚华、舒全峰, 2021）。有领导力的村干部在集体经济发展和分配过程中也会努力创造条件去塑造村民归属感，比如优先安排就业、照顾弱势群体、开群众会、统一思想、挖掘村庄精神、用集体主义观念整合村民等。

2. 村民归属感可以促进村庄集体行动。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反映了成员社区生活的经历，体现了成员对社区的情感和认同，也是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而维系乡村社会资本，增进村民归属感有助于破解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王亚华, 2017a）。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看，归属感可以增强集体认同，帮助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而集体行动又会增强集体认同（Klandermans, 2002），强化共同利益和共同理解，使集体行动得以促进和持续（Mosimane et al., 2012）。研究表明，成员对集体的身份认同是影响集体合作供给公共物品的关键因素（王刚, 2013），集体认同度高的社区，成员倾向于做更多自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愿性的贡献 (Van Vugt and De Cremer, 1999)。从现实来看, 村民归属感有助于激发大家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奋斗, 使村民更有可能自发投资投劳、参与集体活动 (于涛, 2020), 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环境治理行为 (李芬妮等, 2020)。总之, 集体经济可以直接或通过村干部领导力提升村民归属感, 而村民归属感可以促进村庄集体行动。因此, 本文提出假说 4 和假说 5。

H4: 村民归属感在集体经济与村庄集体行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5: 村干部领导力在集体经济与村民归属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文将集体经济、村干部领导力、村民归属感与村庄集体行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除了集体经济之外, 还有其他变量也会影响村庄集体行动。本文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 (IAD) 框架来组织其他变量, 展现研究逻辑, 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 (如图 1)。制度分析与发展 (IAD) 框架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团队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积累提出的用于分析集体行动和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理论框架 (Ostrom, 2005)。这一框架强调了制度环境、行动情境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对行动结果的影响, 是辅助研究设计的强大工具, 能够帮助将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结构化组织 (王亚华, 2017b), 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扩展 (Araral, 2009; Wang et al., 2016)。根据 IAD 框架, 行动者主要包括领导 (组织者) 和成员 (参与者)。因此, 研究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关键就在于回答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领导和村庄成员这一问题。在本文研究中, 行动者具体分为村干部和村民 (农户), 集体经济以集体经济收入来测量, 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来测量。集体经济收入可以直接影响, 也可以通过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间接影响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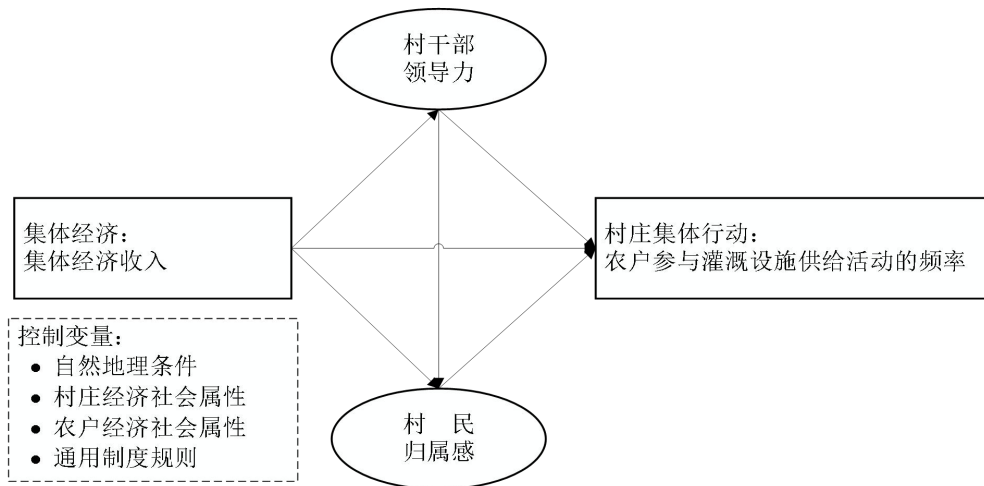


图 1 集体经济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7 年的暑期调查数据。数据收集由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组成的数十支调研团队于当年暑假完成。调查采取的是非概率抽样，主要由指导教师和调研团队根据调研主题确定调研地点。每个村庄随机选择 20~25 户农户，总共调查了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56 个村 17949 户农户。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清理和筛选。首先，进行村户严格匹配，并以农户土地灌溉的主要方式为标准筛选样本，保留选择“集体打井”和“水渠灌溉”两种方式的样本（因为这两种方式在现实中更有可能需要农户参与）。然后，删除相关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减少缺失值对模型估计带来的影响。最后，删除调查户数小于 10 户的村以及调查户数小于 80 户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保证村庄数量与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经过上述清理和筛选之后，最终分析样本量为 3404 户，分布于 7 个省（自治区）210 个村。由于调查属于非概率抽样，样本不平衡较严重，有 51.23% 的农户来自山东，多元回归分析时，本文将单独拟合山东样本，并与全样本拟合结果进行比较，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样本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从样本数据看，村集体没有经营收益或经营收益在 5 万元以下的“空壳村”占比 79.05%，而 2016 年全国“空壳村”占比 74.9%（农业部经管总站体系与信息处，2017），两者相差不大，表明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和广西的样本村庄和样本农户数量较多，两者的样本村庄分别占 54.29% 和 17.62%，样本农户分别占 51.23% 和 21.43%。此外，土地灌溉主要方式为集体打井和水渠灌溉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36.54% 与 63.46%。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省份	村庄	空壳村	非空壳村	农户	集体打井	水渠灌溉
四川	18	12	6	259	8	251
山东	114	94	20	1743	857	886
广西	37	36	1	729	78	651
河南	16	14	2	283	279	4
浙江	11	1	10	149	1	148
湖南	6	5	1	112	17	95
福建	8	4	4	127	3	124
汇总	210	166	44	3402	1243	2159
占比	100.00	79.05	20.95	100.00	36.54	63.46

(二) 变量选择

借鉴已有研究（Wang et al., 2016；高瑞等，2016；Zang et al., 2019），本文使用过程法来衡量村庄集体行动，因变量为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其中，灌溉设施供给活动包括筹建与修缮两类活动，问卷没有具体区分。

核心自变量是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经济收入是衡量集体经济的主要指标。鉴于调查问卷对收入来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源无法严格区分,本文采取的是广义的集体经济收入定义,即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补助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由于集体经济收入规模差异较大,具体分析中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中介变量是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村干部领导力基于受访者对村庄一把手领导特质和领导行为的评价,由6项指标测量(见表2)。本文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从6项指标中提取了1个公因子,命名为“村干部领导力”^①。村民归属感基于受访者自身的认知,由3项指标测量(见表2)。本文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从3项指标中提取了1个公因子,命名为“村民归属感”^②。

控制变量包括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村庄自然地理条件,含3个变量。(1)平原。相比山区,平原地区由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灌溉设施建造和维护的成本较低,农户参与灌溉集体行动的水平较高(Wang et al., 2016; 高瑞等, 2016)。(2)到县城的距离。主要衡量市场或经济发展等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市场距离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存在争议。一方面,靠近市场降低了与政府沟通的成本,自身的需求更容易得到倾听;另一方面,靠近市场,市场活动和退出选择机会增多,会降低成员之间的依赖性,不利于集体行动(Meinzen-Dick et al., 2002)。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村庄距离经济中心越近,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的可能性越大(Wang et al., 2021)。(3)水资源条件。主要衡量资源稀缺性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灌溉供水丰富或稀缺都很难组织集体行动。在供水充足情况下,用水户没有动力通过集体合作来增加供水或节约用水;而在缺水严重的情况下,用水户之间的冲突变大导致合作更加困难(Wang et al., 2021)。简而言之,水资源稀缺程度与村庄灌溉集体行动具有倒“U”型关系(Ararat, 2009; Nagrah et al., 2016)。

二是村庄经济社会属性,含3个变量。(1)户籍人口。主要衡量成员规模。成员规模是影响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不确定。经典的观点认为,小规模群体更容易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曼瑟尔·奥尔森, 1995);成员规模越大,筹资筹劳的集体行动越难实施,灌溉设施状况越差(Ararat, 2009)。但相反的观点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比如存在监督、需要更多资源时,成员规模越大越容易发生集体行动。有研究同时强调了这两种效应,成员规模的增加既可能带来抑制合作的搭便车效应,也可能带来促进合作的规模效应(Wang and Zudenkova, 2013)。因此,折中的观点是中等规模的群体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成员规模与集体行动呈倒“U”型关系(Agrawal and Goyal, 2001; 蔡荣、蔡书凯, 2014; Takayama et al., 2018)。(2)外出劳动力占比与外出劳动力占比的平方。一方面,劳动力外流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蔡荣、蔡书凯, 2014; Wang et al., 2016),会抑制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唐林等, 2019)。原因在于,劳动力外流会直接影响在外务工和居住的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热情(张林秀等, 2005),还会通过影响村干部领导力与村民归属感、社会资

^①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克隆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值为0.879, KMO 统计量的值为0.852,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P 值为0.000, 6项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值在0.71与0.86之间,大于0.5,满足因子分析要求。

^②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克隆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值为0.792, KMO 统计量的值为0.680,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P 值为0.000, 3项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值在0.79与0.89之间,大于0.5,满足因子分析要求。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本、经济异质性与资源依赖性等，进而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Wang et al., 2016)。另一方面，劳动力外流对村庄集体行动也可能产生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从成员规模角度来看，劳动力外流减少了村庄成员规模，有助于降低村庄集体行动的组织、沟通和协调成本，从而促进村庄集体行动。本文认为，劳动力外流是负向影响还是正向影响村庄集体行动，可能与劳动力外流程度有很大关系。因此本文使用外出劳动力占比的平方这一变量来考察劳动力外流与村庄集体行动水平是否具有非线性关系。

三是农户经济社会属性，含 4 个变量。(1) 灌溉经常性短缺。这一变量主要用于衡量资源短缺的经历。有研究发现，灌溉用水经常短缺的农户参加村庄灌溉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小 (Wang et al., 2016; 高瑞等, 2016)，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舒全峰等, 2018; Zang et al., 2019)。(2) 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这一变量主要衡量农户的资源依赖性。家庭收入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户依赖耕地和灌溉的可能性更大。研究发现，户均耕地规模对村庄集体行动有明显促进作用，原因在于“户均耕地规模大的村庄，可能对农田灌溉设施有较强的依赖性，因而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更高” (蔡荣、蔡书凯, 2014)。拥有退出选择 (exit options) 权是资源依赖性低的一种表现，财富拥有量多 (比如农田)、与劳动市场或商业中心的距离近的成员获得更大的退出选择权 (Araral, 2009)，而在成员拥有退出选择机会的社区，集体行动将受到抑制 (Kajisa et al., 2007)。(3) 户主年龄及户主受教育年限。这两项也是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基本因素，但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一些研究发现，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正向影响 (丁冬等, 2013; 苗珊珊, 2014)；另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Wang et al., 2016; Zang et al., 2019)。

四是通用制度规则，含两个变量。(1) 村庄治理失灵。有研究表明，村庄治理失灵不利于村庄团结合作，集体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 (Wang et al., 2016; Zang et al., 2019)。(2) 村组干部报酬。有报酬的村组干部受经济激励和责任约束双重作用，更有可能承担责任，动员村民参与，促进集体行动。

以上变量的含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2。此外，省份差异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在多元回归分析中，通过加入省份虚拟变量来控制各省之间的差异。

表 2 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我家经常参加村里有关灌溉设施的筹建和修缮活动: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28	1.11
核心自变量: 集体经济收入	2016 年村集体收入 (万元, 取对数)	0.87	1.86
中介变量: 村干部领导力	以下 6 项指标因子分析后, 计算得到的因子得分	0	1
办事公道	他是一个办事公道的人: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83	1.03
政治清廉	他是一个政治清廉的人: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84	0.99
责任感强	他是一个责任感强的人: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81	1.01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续表2)			
村民认可	他的工作成绩深受村民认可: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77	1.02
亲力亲为	他对村里的事情都会亲力亲为: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77	1.01
经常鼓励	他会经常鼓励其他村干部和群众: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95	1.02
中介变量: 村民归属感	以下3项指标因子分析后, 计算得到的因子得分	0	1
村庄有家的感觉	村庄有家的感觉: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95	0.88
我喜欢我们村	我喜欢我们村: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99	0.89
告诉别人我住在那里很自豪	告诉别人我住在那里很自豪: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92	0.93
自然地理条件			
平原	本村在整体上是哪一类地形: 平原=1, 其他=0	0.5	0.5
到县城的距离	本村到本县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公里)	22.04	19.21
水资源条件	本村水资源的自然条件(丰裕度)如何: 一般=1, 其他=0	0.3	0.46
村庄经济社会属性			
户籍人口	2016年末本村户籍总人口(人, 取对数)	7.43	0.77
外出劳动力占比	2016年本村外出劳动力占村庄户籍人口的比例(%)	8.08	10.44
外出劳动力占比的平方	外出劳动力占比的平方(%)	1.75	4.07
农户经济社会属性			
灌溉经常性短缺	过去几年中我家耕地经常出现浇不上水的情况: 非常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2.85	1.13
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种植业、养殖业(农业经营收入)=1, 其他=0	0.57	0.5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周岁)	51.41	12.91
户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未上学=0, 小学=6, 初中=9, 高中、中职、中专=12, 本科、大专=16, 研究生=19	7.54	3.55
通用制度规则			
村庄治理失灵	我们村很少发生用水纠纷: 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村庄治理失灵)=1, 非常同意、比较同意=0	0.47	0.5
村组干部报酬	村民小组组长是否有工资或补助: 有固定工资、有误工补助=1, 都没有=0	0.61	0.49

(三) 分析方法

根据研究问题和分析框架, 本文的分析方法和步骤如下: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第一，使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集体经济收入是否影响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第二，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集体经济收入影响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主要路径；并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治理有效和治理失灵村庄的分组比较来考察集体经济收入影响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主要路径是否存在显著的村庄差异。

多元回归模型主要是为了考察因果效应，结构方程模型用来处理多因果关系和潜变量问题，进行包括显变量和潜变量的混合路径分析。结合分析框架，多元回归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CI + \beta_2 CL + \beta_3 SC + \beta_4 CV + \varepsilon \tag{1}$$

其中， Y^* 表示村庄集体行动，即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CI 表示集体经济收入， CL 代表村干部领导力， SC 代表村民归属感， CV 代表控制变量， ε 为随机扰动项。 β_0 为常数项，其他参数为回归系数。

本文中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是难以直接测量的潜变量，且村干部领导力会影响村民归属感，两个潜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采取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前者反映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后者反映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只有中介变量是潜变量，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属于部分潜变量模型。模型设定具体如下。

$$Y = A_y \eta + \varepsilon \tag{2}$$

$$X = \zeta \tag{3}$$

$$\eta = B\eta + \Gamma\zeta + \zeta \tag{4}$$

(2) 式和 (3) 式为测量模型。 X 表示外生观测变量向量， ζ 表示外生潜变量向量，由于外生变量（集体经济收入以及多元回归分析中的控制变量）均为可测变量，相当于外生潜变量均只有一个测量指标，两者相等。 Y 表示内生观测变量向量， η 表示内生潜变量向量，包括村干部领导力、村民归属感和村庄集体行动。其中，村庄集体行动只有一个测量指标“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A_y 为 Y 与 η 之间关联的系数矩阵， ε 为内生观测变量的残差项向量。(4) 式为结构模型。 B 和 Γ 表示路径系数矩阵。其中， B 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Γ 表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 ζ 为结构方程的误差项。

四、集体经济是否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在分析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之前，需要先确定集体经济是否影响村庄集体行动。因此，本部分将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集体经济收入是否影响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表 3 汇报了集体经济收入影响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估计结果。模型 (1) 只包括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为基准模型。模型 (2)、模型 (3)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分别纳入中介变量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模型 (4) 同时纳入中介变量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为全模型。以上模型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估计结果均表明，集体经济收入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体经济收入越多的村庄，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越高；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也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比较模型（2）、模型（3）、模型（4）和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分别纳入还是同时纳入中介变量，集体经济收入的影响系数都显著变小，尤其是加入村干部领导力这一变量。因此，可初步判断存在中介效应，且村干部领导力的中介作用更大。

模型（5）没有控制省份差异，比较模型（4）与模型（5）的估计结果发现，控制省份差异之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提升了6.1%，且集体经济收入的影响系数变大，表明省份是不可遗漏的重要变量。模型（6）、模型（7）、模型（8），分别从模型和样本变换角度对模型（4）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集体经济收入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正向影响非常稳健。

从控制变量来看，地形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反，相比丘陵、山区等，平原地区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更低；到县城的距离影响不稳定，在不控制省份差异的情况下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具有正向影响，但使用山东样本估计时则具有负向影响。水资源条件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水资源条件与村庄集体行动呈倒“U”型关系，这与已有的结论一致。户籍人口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群体规模越大越不利于村庄集体行动，与经典的观点一致。在模型（1）至模型（6）中，外出劳动力占比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具有正向影响，而外出劳动力占比的平方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劳动力外流与村庄集体行动呈倒“U”型关系，与大多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劳动力外流减少了村庄成员规模，而小规模群体沟通成本较低、易于监督和进行选择激励，有助于集体行动，但随着劳动力外流的大幅增加，村庄变为原子化社区，村干部领导力、社会资本、村民归属感和依赖性下降，劳动力外流将产生负向影响。山东样本估计结果反映了后一现象，但并不显著。灌溉经常性短缺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土地经常浇不上水的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更高，这与舒全峰等（2018）及Zang et al.（2019）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反映了农户对农业生产和灌溉的依赖性，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越低。村庄治理失灵和村组干部报酬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具有较大且非常显著的负向或正向影响，与预期方向一致。与治理有效的村庄相比，治理失灵的村庄，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更低；与村组干部没有报酬的村庄相比，村组干部有报酬的村庄，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更高。原因在于，组织动员村民很多时候主要依靠村民小组长，给村民小组长发放工资或补助有助于激励其积极主动履行职责。

表3 集体经济收入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OLS	OLS	OLS	OLS	OLS	Ologit	Oprobit	OLS
集体经济收入	0.044*** (0.012)	0.038*** (0.012)	0.040*** (0.012)	0.037*** (0.012)	0.023* (0.012)	0.078*** (0.023)	0.043*** (0.021)	0.064*** (0.010)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续表 3)								
村干部领导力	0.178***		0.146***	0.140***	0.241***	0.153***	0.139***	
	(0.022)		(0.024)	(0.024)	(0.043)	(0.024)	(0.031)	
村民归属感		0.132***	0.078***	0.050**	0.162***	0.086***	0.066**	
		(0.020)	(0.022)	(0.023)	(0.040)	(0.023)	(0.029)	
平原	-0.158***	-0.077*	-0.124***	-0.071	-0.154***	-0.166**	-0.082*	-0.322***
	(0.044)	(0.045)	(0.044)	(0.045)	(0.040)	(0.081)	(0.047)	(0.054)
到县城的距离	0.000	-0.000	0.000	0.000	0.003***	0.001	0.000	-0.005**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1)	(0.002)
水资源条件	0.068*	0.097**	0.097**	0.109***	0.043	0.204***	0.115***	0.176***
	(0.041)	(0.041)	(0.041)	(0.041)	(0.041)	(0.073)	(0.043)	(0.055)
户籍人口	-0.132***	-0.154***	-0.119***	-0.143***	-0.130***	-0.252***	-0.154***	-0.165***
	(0.035)	(0.034)	(0.035)	(0.034)	(0.025)	(0.062)	(0.036)	(0.043)
外出劳动力占比	0.012***	0.011**	0.010**	0.010**	0.010**	0.019*	0.009*	-0.003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8)	(0.005)	(0.007)
外出劳动力占比平方	-0.029***	-0.021*	-0.023**	-0.019*	-0.028**	-0.035*	-0.018	0.00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0.020)	(0.011)	(0.016)
灌溉经常性短缺	0.099***	0.096***	0.100***	0.097***	0.121***	0.191***	0.106***	0.060**
	(0.019)	(0.019)	(0.019)	(0.019)	(0.019)	(0.036)	(0.020)	(0.025)
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	0.098***	0.077**	0.097***	0.080**	0.085**	0.141**	0.082**	0.119**
	(0.038)	(0.037)	(0.038)	(0.037)	(0.038)	(0.067)	(0.039)	(0.051)
户主年龄	-0.006***	-0.007***	-0.007***	-0.007***	-0.008***	-0.012***	-0.007***	-0.005***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3)	(0.002)	(0.002)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10	-0.016***	-0.011*	-0.015***	-0.026***	-0.032***	-0.017***	-0.035***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11)	(0.006)	(0.008)
村庄治理失灵	-0.377***	-0.320***	-0.332***	-0.303***	-0.273***	-0.603***	-0.328***	-0.275***
	(0.036)	(0.037)	(0.036)	(0.037)	(0.038)	(0.068)	(0.038)	(0.050)
村组干部报酬	0.171***	0.130***	0.153***	0.127***	0.078*	0.245***	0.135***	0.160***
	(0.041)	(0.040)	(0.041)	(0.040)	(0.042)	(0.073)	(0.042)	(0.052)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山东
常数项	4.424***	4.567***	4.306***	4.472***	4.509***			5.139***
	(0.298)	(0.295)	(0.298)	(0.296)	(0.215)			(0.341)
N	3402	3402	3402	3402	3402	3402	3402	1743
R ² /pseudo R ²	0.143	0.162	0.154	0.166	0.105	0.064	0.062	0.144
F/chi2	30.421	36.497	32.927	36.367	30.358	620.816	608.306	21.571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②模型（6）和模型（7）没有报告切点值；③***、**、*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④模型（8）单独拟合山东省样本。

五、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一) 集体经济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结构方程模型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集体经济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干部领导力与村民归属感是重要的中介变量。为了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潜变量与测量误差，进一步厘清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接下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基于理论上是否存在关系、影响路径是否显著等考量删减变量，并结合修正指数修正模型，直到基本满足模型拟合度评价相关标准之后，得到了如下结构方程模型示意图（图2）。测量模型中，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为内生潜在变量。结构模型中，外生观测变量包括核心自变量集体经济收入以及户主年龄、到县城的距离、户籍人口、外出劳动力占比、水资源条件、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村庄治理失灵等重要变量，同时还纳入了省份虚拟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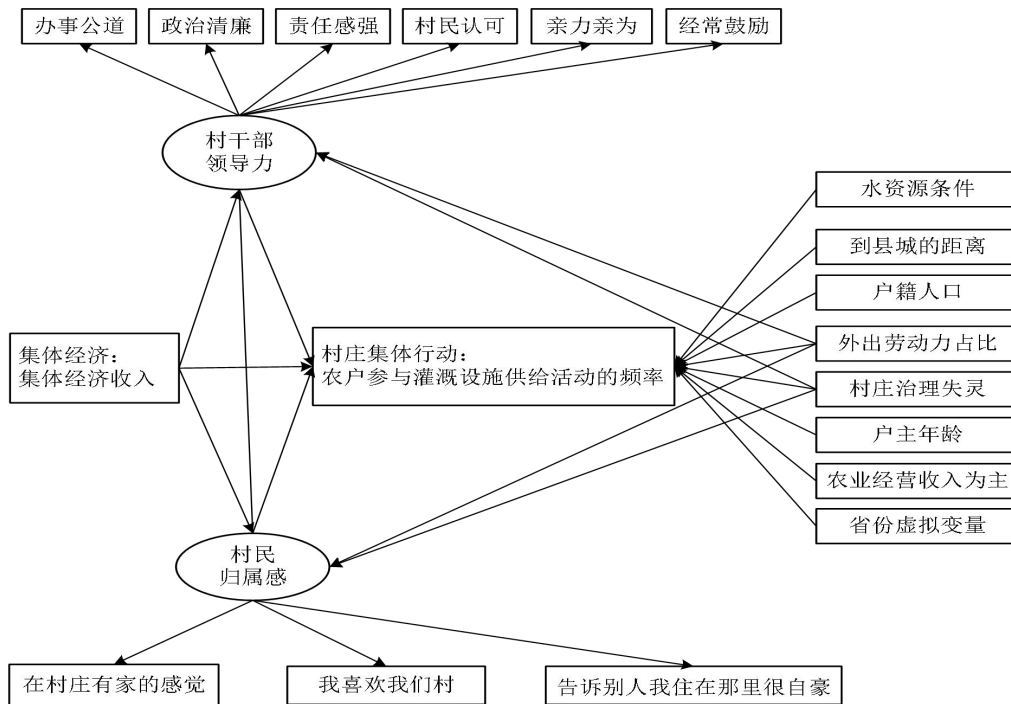


图2 集体经济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结构方程模型

(二) 模型拟合评价

评价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是进行模型建构和结果解释的前提。模型拟合评价包括模型内在结构适配度评价和整体适配度评价，也称为内在质量检验和外在质量评估（吴明隆，2013）。内在质量检验针对的是测量模型，检验测量指标的信度与效度。外在质量评估针对整个模型，评估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的契合程度。

表4呈现的是模型内在结构适配度评价指标与判断标准。因子载荷值（标准化路径系数）介于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0.5~0.95 之间，部分大于 0.71，符合基本的适配标准，且表现良好。潜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大于 0.7，组合信度大于 0.6，表明潜变量的各测量指标间存在内在关联，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量表的信度较好。此外，平均抽取方差大于 0.5，组合信度大于 0.6，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平均抽取方差大于潜变量相关系数的平方，表明量表的区分效度较好。综上，本文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适合进入下一步分析。

表 5 呈现的是结构方程模型整体适配度评价指标、判断标准与适配结果。RMSEA、AGFI、CFI 等重要指标都通过了检验，表明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比较契合，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表 4 模型内在结构适配度评价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载荷值	组合信度	Cronbach's α 系数值	平均方差抽取量	潜变量相关系数的平方
判断标准		>0.5	CR>0.6	>0.7	AVE>0.5	R ² <AVE
村干部 领导力	办事公道	0.870	0.872	0.879	0.540	0.250
	政治清廉	0.801				
	责任感强	0.890				
	村民认可	0.559				
	亲力亲为	0.583				
	经常鼓励	0.630				
村民 归属感	在村庄有家的感觉	0.800	0.816	0.792	0.597	
	我喜欢我们村	0.807				
	告诉别人我住在那里很自豪	0.706				

表 5 模型整体适配度评价

统计检验量		适配的标准或临界值	拟合值	是否适配判断
绝对适配度指数（确定模型可以预测协方差矩阵与相关矩阵的程度）	卡方值（ χ^2 ）	p>0.05	p=0.00	否
	标准化残差均方和平方根（SRMR）	<0.05	0.059	否
	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	<0.08	0.053	是
	适配度指数（GFI）	>0.90	0.952	是
	调整后适配度指数（AGFI）	>0.90	0.935	是
增值适配度指数（理论模型与虚无模型比较）	规准适配指数（NFI）	>0.90	0.902	是
	相对适配指数（RFI）	>0.90	0.880	否
	增值适配指数（IFI）	>0.90	0.910	是
	非规准适配指数（TLI/NNFI）	>0.90	0.890	否
	比较适配指数（CFI）	>0.90	0.910	是
简约适配度指数（评价模型的简约度）	简约适配度指数（PGFI）	>0.50	0.705	是
	简约调整后的规准适配指数（PNFI）	>0.50	0.734	是
	临界样本数（CN）	>200	380	是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三) 集体经济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路径分析

表 6 报告了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分析的结果。上半部分是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从表中可知，集体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村干部领导力以及村民归属感；村干部领导力与村民归属感也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此外，村干部领导力对村民归属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下半部分呈现的是集体经济收入影响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与村民归属感、村干部领导力影响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间接路径。由表 6 可知，集体经济收入影响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有三条间接路径，标准化总效应为 0.084，直接效应为 0.053，中介效应为 0.03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 36.90%。其中，“集体经济收入→村干部领导力→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这一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强度最大，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9.05%。此外，集体经济收入通过村干部领导力影响村民归属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46.71%，村干部领导力通过村民归属感影响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8.71%。

综上所述，集体经济收入对因变量和中介变量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村干部领导力是非常关键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直接效应大于集体经济收入，其中介作用大于村民归属感。村干部领导力，不仅可以中介集体经济收入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影响，还可以中介集体经济收入对村民归属感的影响。

表 6 结构模型路径系数与标准化效应

结构模型——直接效应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村干部领导力 ← 集体经济收入	0.074***	0.008	0.169
村民归属感 ← 集体经济收入	0.035***	0.007	0.089
村民归属感 ← 村干部领导力	0.412***	0.018	0.462
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验证 H1) ← 集体经济收入	0.032***	0.011	0.053
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 村干部领导力	0.132***	0.029	0.095
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 村民归属感	0.147***	0.034	0.095
结构模型——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标准化)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集体经济收入→村干部领导力→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验证 H2)		0.169×0.095=0.016	0.053+ (0.016 0.008+0.007) =0.053+0.031 =0.084
集体经济收入→村民归属感→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验证 H4)	0.053	0.089×0.095=0.008	
集体经济收入→村干部领导力→村民归属感→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验证 H3、H5)		0.169×0.462×0.095 =0.007	
集体经济收入→村干部领导力→村民归属感 (验证 H5)	0.089	0.169×0.462=0.078	0.167
村干部领导力→村民归属感→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验证 H3)	0.095	0.462×0.095=0.026	0.139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注：①***代表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四) 集体经济影响的村庄差异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村庄治理失灵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进一步以村庄治理失灵为分组变量,考察路径模型在不同群组间的差异。Amos 软件提供了多群组多模型分析方法,并直接给出多个嵌套模型的拟合结果。根据嵌套模型卡方值增量不显著、增值适配度指标值差异量绝对值小于 0.05 的拟合评价标准以及 AIC 值和 ECVI 值最小的竞争模型选择标准,本文最终选定参数未限制模型为多群组分析模型^①。表 7 是模型估计结果。从标准化路径系数来看,在治理有效的村庄,集体经济收入、村干部领导力以及村民归属感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集体经济收入对村干部领导力、村民归属感以及村干部领导力对村民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治理失灵的村庄,路径系数的变化比较复杂。首先,集体经济收入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影响转为负向。虽然不显著,但从现实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治理失灵的村庄,普遍面临沟通协调成本大、集体行动困难的问题。此时,如果村庄集体经济收入较多,就可以选择利用集体资金直接提供公共物品、替代交易成本较高的集体行动,因此集体行动相对更少。其次,集体经济收入对村干部领导力仍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系数显著变小,且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影响不再显著。最后,集体经济收入对村民归属感、村民归属感对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的影响变小,但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从临界比值的结果来看,分组样本部分路径的标准化系数之间的差异值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不为 0,即村庄治理对路径系数的影响在两类样本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体而言,村庄治理失灵不仅会削弱集体经济对村干部领导力和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还会制约村干部领导力的发挥;只有在治理有效的村庄,集体经济才会促进村庄集体行动。

表 7 集体经济影响的村庄差异

结构模型——直接效应(标准化路径系数)			治理失灵	治理有效	临界比值
村干部领导力	←	集体经济收入	0.100***	0.236***	-4.140***
村民归属感	←	集体经济收入	0.068**	0.109***	-0.926
村民归属感	←	村干部领导力	0.419***	0.502***	-0.076
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	集体经济收入	-0.012	0.100***	-3.206***
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	村干部领导力	0.027	0.149***	-3.223***
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活动的频率	←	村民归属感	0.092**	0.086***	-0.471

注：①***、**分别代表在 1%、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模型适配度指标良好(RMSEA=0.040, GFI=0.946, AGFI=0.927, CFI=0.907)。

^①具体操作方法、模型比较与选择参见吴明隆(2013)。

六、结论与讨论

农村集体行动的全面衰落是当前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危机的重要原因，如何在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趋势下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改善农村公共治理也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苏毅清等，2020）。对此，一些研究提出了提升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的政策建议（杜焱强等，2016；王亚华，2017a；舒全峰等，2018）。然而，如何提升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呢？本文从集体经济视角切入，认为在农民原子化、村庄过疏化和集体薄弱化的现实情境下，发展集体经济是提升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突破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缓解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危机的重要举措。集体经济可以增强村干部的威信、话语权以及公共管理权力，也可以提高村民经济收益和归属感（于涛，2020），激发干群合作治理村庄的热情（吕德文，2015），进而促进村庄集体行动和公共事务治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7年的暑期调查数据，以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为例，对集体经济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干部领导力与村民归属感是集体经济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重要路径，且村干部领导力的中介作用大于村民归属感。进一步的探讨发现，集体经济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的村庄差异。在治理有效的村庄，集体经济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在治理失灵的村庄，集体经济的影响强度将受到削弱，甚至其作用方向也发生变化。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集体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可以转化为治理资源，为村庄领导和成员提供激励和约束，提升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进而促进村庄集体行动，缓解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危机。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在扶持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基层政府和村庄不仅要关注集体经济收入的增长及其持续性，还要关注如何通过集体经济去提升村干部领导力和村民归属感，进而影响村庄领导与成员的观念和行为。二是必须将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乡村有效治理相结合，利用集体经济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比如将分红、福利等权益与遵守村规民约、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制度和公共事务挂钩，以经济关系加强社会关系，以经济纽带加强社会关联，减少村庄冲突和治理失灵问题，增强村庄公共性，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三是将发展集体经济与提升基层村干部领导力相结合，强化农村领导力的外部供给，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培育和充实村庄领导力过程中的作用。

总之，本文检验了村干部领导力与村民归属感的中介效应，同时考察了村庄治理因素的调节作用，探讨了一种经济因素转化为社会机制的具体路径，深化了集体经济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机制研究，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但本文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一方面，使用的数据为非概率抽样所得的截面数据，样本分布不平衡，无法考察集体经济影响的历史效应，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模型估计精度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另一方面，对村干部领导力、村民归属感以及村庄治理的指标测量有待进一步丰富。此外，本文只考虑了村庄治理这一个调节变量的影响，但集体经济影响村庄集体行动存在众多约束性条件值得讨论。集体经济既可能促进村庄集体行动，也可能抑制甚至替代村庄集体行动。因此，探索集体经济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边界条件具有非常重要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参考文献

-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2012: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余逊达、陈旭东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蔡荣、蔡书凯, 2014: 《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安徽省 102 个村庄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为例》, 《经济评论》第 1 期。
- 3.陈家建, 2011: 《新苏南模式与农村发展》, 《社科纵横》第 3 期。
- 4.陈潭、刘建议, 2010: 《集体行动、利益博弈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岳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其实践逻辑》, 《公共管理学报》第 3 期。
- 5.崔琳, 2020: 《不同村组两种股权管理模式比较》, 《农村经营管理》第 3 期。
- 6.邓卫华、滕军伟, 2020: 《支部领办合作社, 乡村振兴破难题》, 《半月谈》第 5 期。
- 7.丁冬、郑风田、吴磊、周锋, 2013: 《经济、社会异质性与农村集体行动水平——基于湖北省 S 县 40 村 400 个农户数据》,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9 期。
- 8.杜焱强、刘平养、包存宽、苏时鹏, 2016: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以欠发达地区 J 村养殖污染为个案》, 《公共管理学报》第 4 期。
- 9.付明卫、叶静怡, 2017: 《集体资源、宗族分化与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 《中国农村观察》第 3 期。
- 10.高瑞、王亚华、陈春良, 2016: 《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2 期。
- 11.桂华, 2019: 《产权秩序与农村基层治理: 类型与比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治分析》, 《开放时代》第 2 期。
- 12.贺雪峰、何包钢, 2002: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型——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中国农村观察》第 6 期。
- 13.胡丽燕, 2020: 《“股份+善治积分”让村里事变“家家事”》, 《农村经营管理》第 3 期。
- 14.胡荣, 2005: 《经济发展与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 《社会》第 3 期。
- 15.李芬妮、张俊飏、何可、畅华仪, 2020: 《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 1007 个农户调研数据》,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 4 期。
- 16.李秀义、刘伟平, 2016: 《新一事一议时期村庄特征与村级公共物品供给——基于福建的实证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第 8 期。
- 17.卢福营、金姗姗, 2008: 《集体经济资源丰富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以浙江 A 村为例》,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第 5 期。
- 18.吕德文, 2015: 《用集体经济激活村庄治理热情》, 《中国老区建设》第 11 期。
- 19.吕德文, 2019: 《投入不少, 见效不多! 资源进村遭遇“最后一公里困境”》, 《半月谈》第 11 期。
- 20.曼瑟尔·奥尔森, 1995: 《集体行动的逻辑》, 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1.毛寿龙、杨志云, 2010: 《无政府状态、合作的困境与农村灌溉制度分析——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村组农业用水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供给模式的个案研究》，《理论探讨》第2期。

22.苗珊珊, 2014: 《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视角下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参与行为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2期。

23.农业部经管总站体系与信息处, 2017: 《2016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情况》，《农村经营管理》第8期。

24.彭长生、孟令杰, 2007: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25.舒全峰、苏毅清、张明慧、王亚华, 2018: 《第一书记、公共领导力与村庄集体行动——基于CIRS“百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第3期。

26.苏毅清、秦明、王亚华, 2020: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的研究》，《管理世界》第7期。

27.孙爱东, 2018: 《黑土地谋变乡村振兴》，《半月谈》第12期。

28.唐林、罗小锋、黄炎忠、余威震, 2019: 《劳动力流动抑制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吗？——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

29.汪吉庶、张汉, 2014: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议程困境及其应对——以浙江甬村为案例的小集体分成付费制度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第4期。

30.王刚, 2013: 《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问题——兼论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31.王晓毅, 2016: 《乡村公共事务和乡村治理》，《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32.王亚华, 2017a: 《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中国科学院院刊》第10期。

33.王亚华, 2017b: 《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再评估》，《公共管理评论》第1期。

34.王亚华、高瑞、孟庆国, 2016: 《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35.王亚华、舒全峰, 2017: 《第一书记扶贫与农村领导力供给》，《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36.王亚华、舒全峰, 2021: 《公共事物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评述与展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4期。

37.王亚华、臧良震, 2020: 《小农户的集体行动逻辑》，《农业经济问题》第1期。

38.王振标, 2018: 《论村内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从事一议的制度困境谈起》，《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39.吴明隆, 2013: 《结构方程模型：Amos 实务进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40.吴重庆、张慧鹏, 2018: 《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41.项继权, 2002: 《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42.徐朝卫、董江爱, 2018: 《资源型村庄治理中集体经济的多重效应——基于山西H村的经验分析》，《贵州社会科学》第7期。

43.于涛, 2020: 《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下）——烟台市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经济导刊》第1期。

44.张林秀、罗仁福、刘承芳、Scott Rozelle, 2005:《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

45.Agrawal, A. and S. Goyal, 2001: Group Size and Collective Action - Third-parts Monitoring in Common-Pool Resourc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1): 63-93.

46.Araral, E., 2009: What Explain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mmon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 *World Development*, 37(3): 687-697.

47.De Cremer, D. and D. Van Knippenberg, 2002: How Do Leaders Promote Cooperation? The Effects of Charisma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7(5): 858-866.

48.Fujiie, M., Y. Hayami and M. Kikuchi, 2005: The Conditions of Collective Action for Local Commons Management: The Case of Irrig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3(2): 179-189.

49.Glowacki, L. and R. C. Von, 2015: Leadership Solves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in Small-Scale Societi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370(1683): 20150010.

50.Kajisa, K., K. Palanisami and T. Sakurai, 2007: Effects On Poverty and Equity of the Decline in Collective Tank 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Tamil Nadu, Indi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6(3): 347-362.

51..Klandermans, B., 2002: How Group Identification Help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5): 887-900.

52.Meinzen-Dick, R., K. V. Raju and A. Gulati, 2002: What Affects Organiz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for Managing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Canal Irrigation Systems in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4(30): 649-666.

53.Mosimane, A. W., C. Breen and B. A. Nkhata, 2012: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Common Poo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6(2): 344-362.

54.Nagrah, A., A. M. Chaudhry and M. Giordano, 2016: Collective Action in Decentralized Irrigation Systems: Evidence From Pakistan, *World Development*, 84: 282-298.

55.Ostrom, E., 2005: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6.Raymond, L., 2010: Cooperation without Trust: Overcoming Collective Action Barriers to Endangered Species Protectio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4(1): 37-57.

57.Takayama, T., H. Matsuda and T. Nakatani, 2018: The Determina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Irrig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Evidence From Rural Communities in Japan,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06: 113-123.

58.Van Vugt, M. and D. De Cremer, 1999: Leadership in Social Dilemmas: The Effect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On Collective Actions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4): 587-599.

59.Wang, C. and G. Zudenkova, 2013: A Rationale for Non-Monotonic Group-Size Effect in Repeated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89: 116-128.

60.Wang, Y., C. Chen and E. Araral, 2016: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mmon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88: 79-93.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61.Wang, Y., S. Chen and E. Araral, 2021: The mediated effects of urban proximity on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mmon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142: 105444.

62.Zang, L., E. Araral and Y. Wang, 2019: Effects of land fragmentation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mmon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284 villages and 17 provinces in China, *Land Use Policy*, 82: 518-527.

(作者单位: 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²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责任编辑: 陈静怡)

How Does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ffect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Evidence from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vision of Rural Irrigation Facilities

ZHANG Li WANG Yahua

Abstract: 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2017 summer survey data from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Rural Studie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CIRS), this article takes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vision of rural irrigation facilities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how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ffects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can influence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leadership of village cadres, and through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villagers. It can also influence villagers' sense of community through leadership of village cadres, which then affects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them, leadership of village cadr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th. Further discussion also find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villag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on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Village governance failure can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on leadership of village cadres and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restrict the role of leadership of village cadres. Only in the villages with effective governanc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can promote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This stud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ffecting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 Leadership; Sense of Community; Collective A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